

战的医学生涯

苏祖斐著



我的医学生涯

苏祖斐著

文匯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3 号

责任编辑: 车明玉

I25 / 659

我的医学生涯

苏祖斐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编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4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32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24000

印数: 1—3500

印张: 6.5

ISBN7—80521—286—9/G·185

定价: 8.50 元

作者简介

苏祖斐，1898年生于上海。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儿童营养学家，上海市儿童医院名誉院长、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中国营养学会荣誉理事。曾主编《实用儿童营养学》等有关儿科书籍十余种，发表儿内科、儿童营养论文四十多篇。作者用联合疗法首先在国内治愈儿童“不治之症”结核性脑膜炎；用鲜鱼肌喂养婴儿成功为国际首创；首先主持调查九万多例母乳喂养情况并分析影响母乳分泌的原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所赞赏。1985年荣获中国福利会妇幼工作首届樟树奖。

► 在香山路儿童医院



◀ 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合影（后右一为作者）

▲ 1932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左二为作者）

▼ 近照





◀ 获樟树奖后接受孩子们的祝贺



▲ 参加咨询门诊



▲ 与六弟苏祖尧在一起



▶ 九十寿辰

著 者 说 明

宓正明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整理，在此表示感谢。

苏祖斐
1993年12月

目 录

1. 我的童年 (1)
2. 恰似“移民渡江” (6)
3. 母亲与母亲的病 (10)
4. 终与艺术无缘 (15)
5. 作文与名师 (18)
6. 母校春秋 (23)
7. 在母校临床工作中的二
 三事 (33)
8. 北京协和医院P楼 (37)
9. 宣传儿童营养之初 (40)
10. 创业伊始 (44)
11. 维生素C的研究 (49)
12. 出游东岳和南岳 (53)
13. 从难童医院到上海儿童
 医院 (57)
14. 国际儿科会议盛况 (64)

-
15. 在美国进修的日子(67)
 16. 攻克“不治之症”(75)
 17. 中华医学会在申城(78)
 18. 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
 手术队(86)
 19. “三毛”接受预防接种(89)
 20. 有朋自远方来(92)
 21. 送“瘟神”的岁月(94)
 22. 透发麻疹的灵丹妙药(98)
 23. 控制镉中毒(102)
 24. “主动战”和“防御战”(104)
 25. 生命在于运动(108)
 26. 西行散记(111)
 27. 多年梦想成真(115)
 28. 母乳喂养研究(120)
 29. 国际营养界的盛会(125)
 30. 首获樟树奖(128)

-
31. 怀念沪江(131)
32. 在国外友人家作客(134)
33. 欧洲四国之行(139)
34. 家庭保健责无旁贷(145)
35. 义务“承包”之乐(150)
36. 我没有功夫结婚(152)
37. 五好家庭与拼凑户口(155)
38. 我家有医师十七人(160)
39. 我也有病痛(163)
40. 关于长寿的思索(167)
41. 难忘的旧宅和先辈(170)
42. 重现历史的镜头(174)
43. 教学六十载(178)
44. 著作(183)
45. 我的心愿(189)
46. 傲霜小憩(192)
47. 迈步从头越(196)

1. 我的童年

光阴荏苒，春华秋实，年复一年。如今我已是 95 岁的老人了。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去 80 多年，让自己的思绪尽情地在苍穹和繁星之中徜徉，那时，我正是个纤小文弱的少女。

我家原籍福建汀州永定，曾祖子明公由闽迁沪，三代经商，我父亲也是个商人。外祖父是福建同安人，他也经商。因此，我家称得上商贾世家。我出生在上海新北门硝皮弄，应当是“祖”字辈。那时俄国有一位女革命家，名字译音为“苏斐亚”，我父亲就取了一个“斐”字，学名祖斐，“斐”也是一个很好的“词”，《论语》有“斐然成章”之句，我父亲读过《论语》，但这“斐”字并不取自《论语》，可惜我没有成为像我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的女革命家。

我出生于戊戌变法之年，这意味着我一生要经历许多变迁与改革。戊戌变法，给我父母带来新思想，他们向往改革，热心兴学。家中藏书甚众，包括译文及新小说，也有《孙文学说》等，我都读过。以后我父亲创办民立中学，又资助姑母创办民立女子中学，我母亲是民立幼童学校校长。因此，我也可以说生长在一个教育世家。

在我出生前，母亲曾生育一对双生子女，不幸未满周岁，他俩先后夭折，因此，我出生后，母亲神经十分紧张。偏巧周岁时，我患婴儿腹泻，几乎把母亲急坏了。经推拿服药，折腾两个月方才康复。按照旧俗，家中让我拜了二位干娘，以庇护我这条小生命。以后母亲一连生了六个弟弟，所以她特别钟爱我。我母亲说：“物以稀为贵啊。”但是我并不娇惯，自童年起就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和护理病人。

4岁时，母亲自己教我识字三千，识字费了不少劲，以后不用，又忘掉了许多。6岁时我与二弟祖圭到城西幼稚园住读，每星期一在西门外城墙边坐了独轮车与二弟一同去上学，上学时每人拿着一个包裹，我的包裹是红格子的，二弟的是蓝格子的，易于区别，住到星期六才回家。

我家后来迁到制造局路，国立幼童学校就设在宅内。住宅对面有租来的7亩地。我家有花匠，幼童学校的厨师和保姆都会耕作，于是就把这块空地辟为麦田和菜圃。

童年的记忆是美好的：柔柳在晨风中随风飘摆，鸟雀在枝头跳跃，蔚蓝的天空中，云霞温情地抚摸着醒来的世界。那井井有条的菜圃，绿的是黄瓜，青灵灵的是小葱……一年四季菜蔬不断，足可供应幼童学校和我们十口之家的需要。于是，将各种菜蔬按时腌制，如春季腌制金花菜、荠菜、菜苋；秋季糟茄子；冬季大白菜，还有干蚕豆，干黄豆。我家老保姆还会酿酱，可以酱茄子、酱黄瓜。我们也试种棉花，只是点缀而已。课余时间，我常到菜园学圃，所以我尚不至于将韭菜和小麦

相混淆。

家中种了不少花卉，由花匠照料。没有花房，许多花卉难以度过寒冷的冬天。于是家中盖起了一座小花房，可容纳 300 盆花。阳光透过玻璃窗一缕缕斜射下来，宛如一根根金色的弦，扶疏的绿叶间绽出一颗颗五颜六色的蓓蕾，我常在花房里浇花，花影灼灼，水珠莹莹，这儿处处充满着生机。

古人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我家也常年以菊为友，在宅院的东篱下遍种菊花。不光两位舅舅会种菊花，母亲也爱种菊花。耳濡目染的，我对种菊花也产生了浓郁的兴趣。

种菊花很辛苦，也大有学问。春季来临，我和母亲一起折枝播种，稍后迁入瓦筒，瓦筒是以三块瓦片用铁丝扎成筒状。菊枝容易被虫侵蚀，我每天早晨起来提着一支毛笔，蘸着碗里的清水将虫子轻轻洗去。还有，蚱蜢要吃叶子，缺少叶子，花就不好看了，因此，清晨起来捉蚱蜢亦是我的任务之一。浇水施肥更是大有讲究，我用一只小竹筒把水轻轻地灌在盆泥上，施粪肥时我总是小心翼翼，不让粪肥溅上叶子，否则，叶子会枯萎的。菊花长叶期，我还用草汁作肥料，开花季节则施人粪肥。总之，我想尽一切办法，把菊花的叶、梗、花都严密地保护起来。

重阳登高时节，菊花怒放，母亲请来大舅父帮着装盆。我家备有紫砂的签筒盆、马槽盆数十只，配以盆架，在会客室内搭成小山一样的盆景。那些菊花，颜色有红、黄、白、紫等各色，异彩缤纷。花形十分优美，有娇小玲珑的，有魁伟挺秀的……令人目不暇接。我们

还为菊花取了饶有意味的名称，如：二乔、醉杨妃、鸳鸯景、钓诗钩、金背红、金带、玉带、绿菊等。

令人不解的是，越是名贵的品种越难以长得好，倒是早白、早黄、消息子等普通品种反而容易长得丰满多姿。这也许是名贵品种太娇嫩吧。

大舅父家在日晖港，离开制造局路不过几里地，他家种有许多桑树，每年养蚕卖茧，贴补家用。那年我才10岁，干活十分勤恳，亦十分细心，每次去大舅父家，看到竹匾中蠕动着白白胖胖的蚕宝宝，总觉得十分可爱。

有一次，我向舅舅要了几百条小蚕带回家去饲养，桑叶也由大舅父供应，我还经常向他讨教养蚕的经验。日积月累的，倒也增长了不少养蚕的知识。比如，养蚕用的新鲜桑叶不能浸水，否则蚕吃了会“拉肚子”；蚕的一生要经过头眠、二眠、三眠、大眠。我还晓得了清除蚕粪的好方法：在竹匾上放着一张网，网眼有一定大小，蚕和桑叶搁在网上面。清除蚕粪时，只须把网轻轻向上一提，蚕张在网里，而粪，却全留在匾上了。

我还用稻草扎成架子，观察蚕是怎样“上山”结茧的。我一边观察一边在纸上作记录，有时观察到深夜十一二点钟还不想睡觉，慈祥的父亲干脆陪着我一起熬夜，有时，我就煮些菜粥与父亲一起宵夜。

以后的几年中，我每年向大舅父要二三百条小蚕来养，而且总是养得好好的，全部存活、结茧。因此，大舅父经常夸奖我聪明能干，说我小小年纪，钻研养蚕的工夫却十分深。后来，直到袁世凯的大兵烧毁了我

家的老屋,我才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蚕宝宝。

学圃、种菊、养蚕,使我对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养蚕,培养了我的耐心,还培养了我认真观察事物的本领。

2. 恰似“移民渡江”

辛亥年农历九月，武昌首举义旗，全国响应。我家离江南制造局仅三里之遥。一天下午2时许，忽然汽笛大鸣，长达15分钟以上，接着大批工人从制造局走出来，路经我家门口。我父亲热心革命，忙着在办公室工作，这天没有回家。我和弟弟及一群小同学在门口观看热闹。现在想来，当时工人是放工回家。工人队伍中忽然出现了我的姨丈蔡绥之。他是个外语工作者，他知道我父亲成天不在家，放心不下，就特意来看望我们，见我们没有惊惶失措，他才放心而归。

此后二三天内，据说革命军还没有攻进制造局。最后，由革命工人引导，从一条小路进攻，终于告捷。这样，上海就全部光复了。

第四天下午，红十字会狄医师带队前来救护。因为饮食店都关起门来，不接待顾客，狄医师他们饥肠辘辘。正巧走过我家门口，见大门敞开着，周围一片寂静，便领着队伍走进院来。我母亲竭诚欢迎他们，临时做了许多面食饷客。父母崇尚革命，自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家在制造局路，住宅的后面，有一所湖北会馆。那时开来了一支“湖北决死队”，有队长、秘书和士兵，

他们很守纪律，与我们幼童学校的孩子们很友善，每隔几天就到我家的草坪上来操练队列。我经常和弟弟一起好奇地观看：“一、二、一”、“立正、稍息”，眼前的一切，使少女的我编织起一串串美好的梦幻和希望。

几个月后，“湖北决死队”全队都开走了，不知去向。临别时，他们赠送教职工和学生每人一块小银牌，可以挂在胸前。银牌上刻着：“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们也不了解这两句诗对他们这支队伍或对时局有什么含义。幼童学校回赠他们一面红旗，旗上题有“鹰扬”二字。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支队伍是来上海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

当时，袁世凯称帝的消息甚嚣尘上，局势十分紧张。1913年的春上，有一天，一支小队伍在我家麦田里放了一夜的枪，把我家麦子都践踏坏了。农历六月，风声愈来愈紧，我父亲忙于业务和组织商团事务，常住在办公处不回家。我家所处的制造局路是军家必争之地，地势险要。当时，我已有六个弟弟，最小的才三个月，母亲因为孩子多，十分担忧，父亲却处之泰然。到农历六月十九日，简直有点人荒马乱了，母亲决意带领家人暂避大南门外民立中学。

那时正值酷暑，幼童学校学生已回家，民立中学也已放假，有许多教室可以暂住。谁知当晚即开始枪战，一颗流弹从民立中学校舍呼啸而过。我们觉得大南门外也不安全，就决定避到父亲办公室去。

没有交通工具，当时环城电车还没有建造，母亲、二位保姆，带着我和六个弟弟，一行十人，简直是一支不小的避难队伍。我们沿着城濠路艰难地从大南门向